



历史街区保护,需有十年磨一剑定力

■ 本报记者 柳森

说起2019年上海新诞生的文化地标,不能不提上音歌剧院。它不仅是一座凝聚了多方心血、来之不易的新建筑,更以几代上音人的梦想为底色,点亮了建筑所在的整个街区。

说起如今上海市民的公共文化生活,不能不提思南公馆。它所依托的思南路花园住宅区是上海优秀历史建筑群中的典型代表。很多市民热爱、钟情于这个街区的风范与格调,却未必知道,这个街区也曾黯淡、破败,直到1999年前后,开始孕育新的活力。

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邵甬教授,是这两个街区焕发新生背后最主要的见证者、参与者之一。回眸上海历史街区保护与再生20年来路,邵甬感慨万千。

没有先例的探索

解放周一:十余年前,您第一次踏入如今思南公馆所在的街区,当时是怎样一个印象?

邵甬:印象很深刻,当时拍的很多照片至今还留着。

最开始的印象,就是感觉整个街区年久失修,房子破破的,环境看上去杂草丛生,花园很大,但疏于打理。整个街区里,房子、院子内外搭建情况非常严重,几乎看不出原来的建筑到底是什么样子。

还有一个很深的印象,就是这里“72家房客”的现象比较严重。当时,为了确认一栋楼到底住了几户人家,我们经常通过电表去确认。进入住宅,情况也比想象中杂乱。有些建筑的主要结构还在,但内部已经残破不堪。

解放周一:如今,经常会有人把城市更新比作给城市有一定历史年份的区域“动一场手术”。你们当时是怎样确立“手术方案”的?

邵甬:这个街区所在地属于如今已并入黄浦区的卢湾区。当时的卢湾区规划局委托我们做一个研究,起因是这块区域马上要开发了,已经有了开发计划。按照当时的开发计划,除了周公馆这几栋花园洋房不拆以外,其他没有保护身份的建筑可以拆。把它们拆掉以后,准备建一个高层住宅楼。

这其实是上世纪90年代非常普遍的一个做法,因为你不是保护建筑,也没有任何保护措施,那么好的地段,那么好的交通区位,如果做成高层住宅楼,真金白银马上可以看得见。这个开发计划当时已经有了。对我们来讲,当时最大的问题,就是怎么去改变原有的计划。这个很难,于是,我们就开始做调查和研究。

研究分为两个部分。第一部分是对地块里的所有建筑,一个一个地做调查。我们到档案馆把历史建筑的原始资料都调出来,仔细了解每一个建筑最初的格局,然后再到现场去一一对应,先把所有建筑的初始特征搞清楚。

第二部分的工作是研究整个区域的功能。当时研究下来,我们发现这个街区真正有价值的不仅仅是周公馆这几栋房子。梳理整个区域建筑发展脉络,我们能够看到上海城市百年发展的历史进程,而且,不仅是这里的建筑,就连沿复兴中路、思南路的梧桐树,整个街区内部的大树、围墙、街巷,都是这个街区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还只是这个街区价值的物质性层面。

这个街区人文价值的部分,是我们在做每个建筑的调查时,一个个挖掘出来的。比如,沿着复兴中路有一栋房子,是柳亚子曾经著书的地方。思南路95号原来是梅兰芳在上海的住宅,还有很多翻译家、音乐家、文学家在这里生活过。当然还有周恩来、董必武等当时在周公馆居住过。这个街区所承载的人文信息如此丰富,是我们此前没想到的。随着调查不断深入,慢慢地,整个街区物质、非物质的价值与特色逐渐立体了起来。

这一切让我们愈发觉得,不能只是保护那么几栋房子,而是应该对这个街区进行整体性保护,并形成一个规划。如果按原计划把这里变成一个高层住宅区,会给更远的未来留下遗憾。

在这个规划里面,我们明确地提出:第一,这个街区应该从建筑的保护转向历史环境的保护。第二,我们不能仅仅是把建筑保护下来、留存下来就好了,还要把它们的价值充分地发挥出来。这里所说的价值,不仅有历史的价值、艺术的价值,还有由建筑、街区衍生出来的社会的价值、文化的价值,等等,明确这个大方向很重要。后面,我们基本上就是循着这个方向往前走的。

思南公馆的幸运

解放周一:当时,这一系列工作背后最大的挑战是什么?

邵甬:最难的是说服工作。因为如果按照我们这个方向去推进的话,第一,不可能马上实现经济价值;第二,没有先例。上海单体建筑保护的案例上世纪90年代就有了,但是,对成片的街区进行整体性保护,实属首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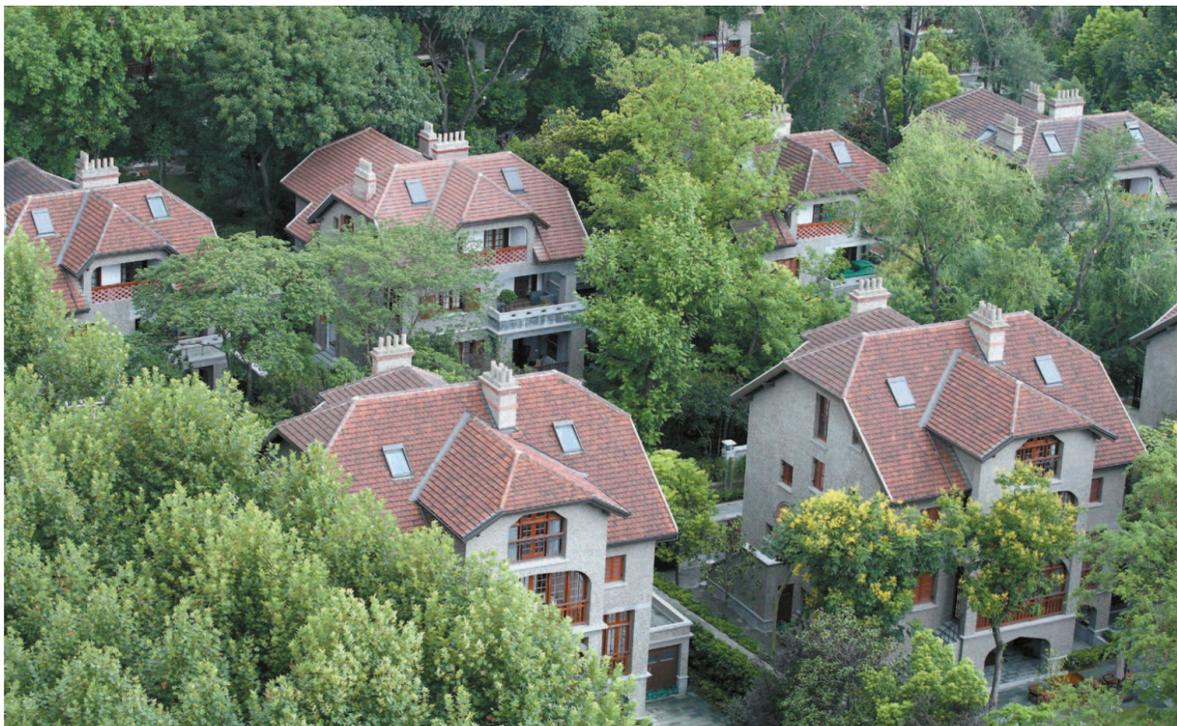
当时的方向,我们很清楚,我们很坚持,但管理方和开发商还不太能够确定。历史街区保护与再生前期需要为修缮和房屋置换投入巨大资金,钱从哪里来,什么时候能够收回?按照原计划,思南路和复兴中路都要拓宽,而按照我们的建议,这路是没拓宽了,否则复兴中路南面第一排房子就面临拆除。这下怎么办?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。

这种情况下,最难的是达成一个共同的目标。不记得汇报了多少次、讨论了多少次,大家从一开始心里都没底,到后来,一起想办法,为整个方案寻找可行的切入点,得到市、区领导的支持,得到开发商的支持。

现在回过头去看,在那样一个时间段里,思南公馆是很幸运的,并最终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保护道路。如果当时大家都说不可能,都没有在方向明确后一起想办法,就没有思南公馆的今天。

解放周一:如今再回望,您有没有留下什么遗憾,或者觉得有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?

邵甬:我感觉,保护规划明确了以后,在空间、景观、建筑的设计等部分可以再多斟酌一下。历史街区建筑的保护一般分为两个部分。



俯瞰思南公馆。



上音歌剧院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。



夜色中的上音歌剧院。

均 蒋迪雯摄

一部分是老建筑的修缮,把老建筑的特征重新找回来。在这一块,当时我们还是很精益求精的。

另一部分就是新建筑如何融入既有的环境氛围。在当时的思南路历史街区里面,有一些乱搭乱建的情况,还有一些建筑年久失修,周边路段的施工加速了它们的破败。按照我们的规划,这部分房子基本上需要拆除,拆除之后,就面临如何在“空余”出来的空间里新建一些建筑的问题。

为此,我们明确了新建建筑一定不要做成“仿古建筑”的原则,要求新建筑的高度、材料、颜色等要和历史环境相契合,还要在此之外营造一些公共空间。当时,建筑师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研究。但现在回过头来看,那时留给我们细化研究的时间还是太短了,在空间尺度的把握等方面应该更精细,更有耐心一点。

思南公馆是幸运的。街区风貌保护工作基本完成以后,业主方做得特别好的,就是在整个施工完成以后,在这个空间里策划、组织了大量公益性且面向整个城市的公共文化活动,如果没有他们后续的发力,思南路历史街区很可能一不小心就成了一个旅游景点,或者只是成为一个供人消费的空间。这在上海这样一个国际性大都市的高速发展期里是很难能可贵的。

研究是风貌保护的前提

解放周一:十余年,您参与了上音歌剧院的新建,很多人以为上音歌剧院是一座全新的建筑,为何也会面临历史风貌保护任务?

邵甬:上音歌剧院的情况比较特殊。这块地属于上海音乐学院,拥有一个可以为全校师生提供教学实践和国际文化交流的场所,是几代上音人的梦想。但因为这个基地所在的区位太重要了,位于上海衡山路—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(以下简称“衡复风貌区”)的核心区域,受到一系列风貌保护方面的硬约束。

上音方面曾面向全世界进行建筑方案招标,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既满足校方需求,又能与周边环境风貌相契合的方案,可惜因为种种原因,一直未能如愿。

2014年,我在徐汇区规划与土地管理局挂职副局长一年,分管风貌区保护与管理工作。上音是其中之一处很重要的工作点。在此机缘下,我了解了上音方面的难处,提出通过做研究来寻找项目的突破点。毕竟,对于这样一个

规格的设计而言,请建筑大咖来做设计并不难,难的是做出真正符合要求的设计。如果设计者对所在基地的历史、文脉、风貌、环境以及建筑功能没有深入了解,是很难将设计引向正途的。所以,一切工作得以展开的前提,还是要做好前期的研究。

巧的是,当时,法国建筑师包赞巴克正好有事来沪访问。他是法国首位获得建筑界最高奖普利茨克奖的建筑师,擅长将一个大型建筑恰到好处地融入街区,更巧的是,他曾参与巴黎音乐城的设计,对音乐建筑有独到见解。在实地参观并了解相关情况以后,没想到,他一下子就很有兴趣,答应帮助我们一起来做上音歌剧院建设前的研究。研究内容包括整个建筑的尺度问题与功能定位;建成后的歌剧院到底面向校内、面向校外,还是两者兼具;如何既体现建筑独特风格,又符合风貌保护要求,还能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。要知道,上音方面对这个歌剧院的声学要求非常高,就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,我们的合作开始了。

最终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座上音歌剧院,是法国包赞巴克建筑事务所、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(集团)有限公司、徐氏声学、英国剧院设计咨询公司等中外团队联合设计的成果。通过媒体的传播,很多市民已经了解了这座建筑的一些特点。比如,它是国内首个采用整体隔振技术建造的全浮结构歌剧院,设计师通过精准、巧妙的设计,解决了建筑紧邻轨交线导致的隔振、隔音问题。但同样值得大家留意的是,最终实现的这个建筑外部看上去非常低调,却又和周边环境、和风貌区整体融合在了一起。上音歌剧院是一个体量很大的建筑,这是歌剧院功能要求使然。但如果从外面看,你并不会觉得它很大。这背后靠的就是建筑大师一系列精心、巧妙的处理,以及扎实的前期研究。

上海有了希望坚持的方向

解放周一:如果说,10年前的思南公馆改造工作尚处于探索期,今天再放上音歌剧院的规划建设,大家的共识是否更容易形成了?还是说,相关工作仍然会遇到新的难题?

邵甬:诚如你所说,思南公馆当时的保护工作真的是探索。在1999年,思南路花园住宅区作为上海市政府确定的“历史建筑与街区保护改造试点之一”,在理念、目标和方法层面,都具有非常特殊且重要的探索性意义。

但此后的十余年间,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重新划定,每一个历史文化风貌区都编制了相

应的保护规划。市、区层面先后出台了相应的风貌管理规定和办法。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领域的制度建设基本框架逐步形成。一系列制度建设,使位于衡复风貌区的上音歌剧院建设有了可循的章法。一旦遇到问题,大家一般不需要从制度上进行探讨,更多地聚焦操作层面的具体问题。

就像这次市、区规划局与包赞巴克团队交流、讨论,从一开始就同其明确,“我们会以‘巴黎的要求’来评价你的设计。”

解放周一:什么是“巴黎的要求”?

邵甬:巴黎对历史风貌保护的要求非常严格,不仅城市整体控制得非常好,对街区中新建筑与周边环境协调方面的要求也非常高。所以,这一次在上海,我们也希望能够在鼓励高品质当代建筑实践的同时,遵从严格的风貌保护要求。希望新建的建筑能与既有的周边环境协调一致、相得益彰。这是上海历史风貌保护应该有的一种态度,也是上海应该鼓励、坚持的一个方向。

经过多轮次讨论,包赞巴克把更多的思考体现在了最终的设计成果中。如今,在上音歌剧院东面沿街角转弯处,设计师特别关注到了整个建筑与周边环境的自然过渡与衔接,并形成一个适度的开放空间。但是,沿淮海中路、歌剧院西侧靠近上音校园入口的部分,无论是建筑立面,还是其他设计细节,都处理得比较低调、优雅。大师的作品,宛如从历史的环境中“生长”出来。

解放周一: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工作机制,确保合作者之间积极、充分的交流与讨论?

邵甬:在此过程中,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机制就是专家特别论证制度。每个阶段成果出来后,我们都会组织方方面面的专家,一起来看目前的设计是否符合要求,并在讨论当中推动各种问题的解决。

解放周一:历史街区的保护与再生,是上海新一轮总体规划城市更新中的一个重要内容。站在这个新的起点上,上海会否面临新的挑战?还是说,我们只要沿着既定的路,一步一步往前走就好?

邵甬:我最近在上海又跑了几处街区。总体的感受是,现在我们真的面临新的挑战。

如今,城市更新这个话题非常的热门。越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,我们越是要警惕,城市更新成为一棵“圣诞树”,什么都可以往上面挂;我们要注意区分,哪些项目是真正的更新,哪些则属于城市更新再开发的范畴。我们还要当心,别让一些微更新项目变成一场新的城市美化运动。所谓城市美化运动,往往形式大于内容,却未必能真正切入社区的实际问题。

观察

一双上海老字号绣花鞋的台北奋斗史

■ 周天柱

商家老字号,历来是城市亮丽的名片。最近,去我国台湾参观、访问,有机会实地了解了上海老字号“小花园”在宝岛的发展,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

从台北捷运西门站6号口出站后,峨眉街上一间不起眼的店面引起我的兴趣。白底红字的木质招牌上刻着“小花园女鞋公司”7个整体大字。明亮的大橱窗内,摆放着一双双簇新的绣花女鞋。步入店内,绣花鞋漂亮的鞋面上精心绣缀的牡丹、凤凰、菊花、梅花争奇斗艳,艳红、绛紫、翠绿或鲜黄,把店堂点缀得如同店名“小花园”一般花园锦簇。

1936年,小花园鞋店在上海创立,后迁至台北。面对我这位上海来客,年过七旬的“小花园”第三代传人陈弘宜十分高兴。谈起该公司屹立不倒的秘诀,他用一句话吐露真谛——“限量发行,让顾客永远有新鲜感。”

真正做到这一点极为不易。所谓“限量发行”,擅长念“鞋经”的陈弘宜将现代与传统绣花鞋做了对比,后者因为缠足缘故,两脚大小不一,必须一只只脚测量,一双双鞋做,相当费功夫。由于价格高,只有富人家的女性才穿得起。现代绣花鞋虽不用费力量脚定制,但由于绣花仍须手工,不能像其他鞋子可用机器生产,因此数量依然不多。

谈及“新鲜感”,陈弘宜坦陈公司的设计团队能将传统融入新潮。为了抓住商圈年轻消费者的心,以及应对时尚潮流推陈出新,陈弘宜仍不时翻阅流行杂志,四处走动观摩,激发创意。

他说店内以丹宁布(粗斜纹布)做成的绣花鞋,还有绒布面娃娃鞋,都是他观察市场后的改良款,深受年轻人喜爱。与传统绣花鞋最大的不同,就是牛仔布和绒布必须以机制刺绣,绣线也改用棉线。

据陈弘宜的观察,光顾“小花园”的客户从18岁到80岁都有,大致可分成四类:年纪大又有复古情怀的外地老太太;过去穿木屐,没有机会试过绣花鞋的本地老太太;赶时髦,追新潮的年轻女性;慕名前来的日本观光客。

如果绣鞋一成不变,就算制作得再精美、手工再好,也不能长久维持。现在的“小花园”店内,除了可以看到祖父辈、父辈留下来的传统绣花鞋和室内拖鞋式样,改良型的绣鞋也比比皆是。

“你看,这双鞋就是我设计的,”陈弘宜指着一双户外可穿的绣花拖鞋说,“此鞋保留精美的绣花鞋面,中底和鞋里改以皮面,再配以塑料鞋底,美观、舒适、耐穿。”

陈弘宜的鞋头也花样百出,把时下流行的方头、尖头等一一纳入,再配上平底、高跟、细跟的各种搭配,让“小花园”的绣花鞋充满流行、时尚的新味。而最让陈弘宜得意的是,橱窗里陈列的一双被称为“大红轿”的绣花鞋堪称“镇店杰作”。红绒鞋面上,龙与凤翩翩起舞。它与传统礼服巧配,开拓出一片吸引眼球的崭新天地。

陈弘宜告诉我,他会根据不同需求,设计不同鞋面的绣花图案,再由老师傅飞针走线。一般一种图案只做10双鞋,只有预计销售趋势特好的鞋样,才大胆预做20来双。限量发行,花色独特,是“小花园”立足的精髓所在。仅20多双新颖款式销售完后即断供,顾客完全不必担心自己所穿的绣花鞋会满街皆是。

还有就是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价格。与一般皮鞋、球鞋、布鞋最大的不同是,绣花鞋不太耐穿,常穿的寿命仅两三个月,为此成本与定价都不能太高。现今“小花园”传统绣花鞋均价为500元新台币(1元人民币约合4.51元新台币),最贵的也不超过1200元新台币,相当于流行鞋款一半不到的价钱,非常实在。

走过70多年历程的“小花园”,一度也曾跌入谷底。店里堆满了卖不出去的绣花鞋。鞋面上一朵朵牡丹、菊花,一只只凤凰、飞龙也都存放在仓库里,一待就是好些年。有趣的是,卖不出去的滞销鞋款或试穿变形的鞋都由陈弘宜的太太接收。陈太太还笑言,应尽量多挑些大尺码的鞋供客人试穿。只因太太脚大,只要鞋一显旧了,她就可以换穿。

在陈弘宜接手“小花园”20年后,吹起复古风,绣花鞋变成复古的代表经典,流行时装、牛仔裤配上绣花鞋,更能展现出女人细致与温柔的风姿。

“小花园”的新款一上架很快就售罄。但一向随心所欲的陈弘宜并没有乐昏头,还是按老规矩营业,正午12时开店,18时准时打烊。每天店还没开门,急欲购鞋的顾客就已排成了长龙。傍晚时分,还有不少鞋迷央求老板晚点关门。

(作者系上海东亚研究所研究员。摘编自上观新闻“港澳台”栏目)